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1053) 成果

语言意识与
语言批评的
维度演变

王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维度演变

王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维度演变/王丹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4

ISBN 978-7-5426-4568-5

I. ①语… II. ①王…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533 号

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维度演变

著 者 / 王 丹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装帧设计 / 恽 超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40 千字

印 张 / 13.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568-5/H·31

定 价 / 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鸣 谢

本书作为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13YJC751053)的最终成果得到了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2013 - GH - 561)、信阳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青年骨干教师基金(2013GGJS—17)与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谨此致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学审美性与语言形式的独特表现	19
第一节 作为“文学性”的语言与形式	19
第二节 文学语言形式的特征、构成与功能	24
一、语音表现形式:文学语言的特殊性	25
二、文学语言的构成:程序奇特化与材料形式化	29
三、文学语言的结构功能	39
第三节 语言形式的问题与思考	47
第二章 语言形式与语义复义的有机统一	52
第一节 以“文”为本和文学特异性	53
一、以“文”为本:作品语言形式的本体性	54
二、文本有机构成与文学语言的语义特征	59
第二节 语义多重的表现形态与修辞组织	68
一、含混	69
二、反讽—悖论	73
三、隐喻	78
四、张力	83
第三节 文本语义结构的意义和问题	86
第三章 意义生成与文学语言的结构模式	92
第一节 “结构”问题的理解与差异	93
第二节 文学结构的抽象形式与系统化模式	98

一、语言的诗歌功能	99
二、语言的深层叙事结构	104
第三节 文学语言的符号结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111
一、文学的二级符号系统:内涵义与外延义	112
二、文学的符号意指系统:元语言与含蓄意指	116
第四节 “结构”的问题性	120
 第四章 文学生产与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	125
第一节 “语言转向”的彻底性:文学、语言与实在	126
一、“语言转向”的双重内涵	127
二、语言哲学与语言活动	131
第二节 “文本”的解构力量	137
一、文本性:文本之外空无一物	138
二、文学语言的修辞性	148
第三节 “文本”的意指开放	160
一、文本:能指的编织物	161
二、文本作为互文性	169
第四节 由语言到话语	179
一、一切均在话语之中	180
二、话语建构中的“东方”	188
 结语:语言批评演变的回顾与启示	194
主要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8

绪 论

“语言转向”^①(Linguistic turn)这一理论术语,鲜明地表征了西方 20 世纪人文研究的整体状况与知识语境,“语言问题从未如此时这般渗入到如此最为多样的研究,以及如此异质的话语的全球视域之中。”^②在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整体变革之中,文论领域对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人们普遍意识到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首先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是文学得以存在和建构的本体性根据,对于“语言”的把握与认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我们对于文学的属性、特征及其功能的探讨与理解。而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现代语言意识,文学研究转向对语言的研究,把语言问题视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从语言维度对文学展开研究的语言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③)也因之得以产生与建构。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类型,语言批评将语言置于文学活动的中心,高度关注语言对于文学的规定性,把语言研究作为理解与阐释文学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其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之中,无处不充斥着“语言”的身影,“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 20 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④但是,对于

① 作为分析哲学提出的术语范畴,“语言转向”的本意并非指哲学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而是指哲学研究由认识论的探索转向对语言的思考。事实上,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研究语言问题的途径与关注点是不同的,大部分语言哲学家,如弗雷格、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与奥斯丁等,并不认为语言学的经验描述是哲学研究的兴趣之所在,也不认为它是进行语言研究的唯一方法,他们认为二者在研究途径以及理论旨趣上是迥异的(具体参见[法]保罗·利科. 哲学主要趋向[M]. 李幼蒸,徐奕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53—354.)。因此,本书采用“语言转向”而非“语言学转向”的翻译,并在本书第四章进行相关探讨。

②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6.

③ 语言学领域也有这个术语,但更多是指批评话语分析、语篇分析或批评语言学,即从语言的跨学科角度对个体或群体的语言使用,及其所体现、生产与维护的制度性统治、社会不平等乃至权力关系进行批评分析的理论、方法(详见 Roger Fowler. Linguistic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英]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21.

“语言”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具体的批评理论都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它们之间的语言意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乃至相互抵牾的现象。正是这种语言意识上的差异,构成了语言批评自身发展、演变的基本逻辑线索,以及 20 世纪西方文论从整体上发生转向的内在动因。

从语言意识的差异和嬗变来看,语言批评探讨语言问题(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的具体思路与方式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即对“词与词之间关系的研究”和对“词与事物或主观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①这两个时期分别对应着 20 世纪西方文论“由文本之外至文本之内”以及“由文本之内至文本之外”的理论范式转换。就时间维度而言,前者主要处于 20 世纪初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后者则基本处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直至世纪之交;而就空间维度而言,前者主要呈现为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②与结构主义这条前后相继的理论轴线,以及与之基本平行相交的英美新批评。作为语言批评的审美自律之维,它们主要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作为语言理论资源,关注文本内部构成中的语言要素,从语言本身的形式属性与特征出发对文学进行分析与阐释;而后者则以后结构主义批评思潮^③为主要代表。作为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之维,它将“语言”视为一种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实现了由静态语言观到动态语言观的拓展和转变,把语言的“语用”层面作为进行文学研究的平台,着重探讨动态的语言活动对于文本生产与文学活动的影响与规约。

毋庸置疑,语言问题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问题意识”,不仅形成了 20 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知识结构、研究语境与价值观念,也为我们审视、把握各种理论思潮在文学研究上的有机连续关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参照系。本书研究意图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一批评理论的话语谱系作为考察对象,以语言意识作为基本视角,对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研究格局进行分析与探讨,进而呈现出语言批评对文学进行语言研究的维度演变

① [美]J. 希利斯·米勒. 重和解构主义[M]. 郭英剑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9.

② 其实在成员构成上,俄国形式主义的布拉格学派往往互有交叉。而本书主要采用时间和成员相结合的划分方式,以 1914—1930 为界,将这个时间段内属于或曾属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家都归纳为前者。此外的归结为捷克布拉格学派。在叙述中,本书将重点论述前者,只在各章节中对后者进行间或涉及。

③ “后结构主义”是一个难以予以准确界定的概念,学界对于它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流派,但更多的认为它是一种源于结构主义,但又很多重要特征上发生了偏离的、范围很广的理论批评思潮。如艾布拉姆斯认为它是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出现的以“理论的首要地位、消除主体的中心地位、阅读—文本—书写,以及话语概念为共同特征的各种批评角度和方法”,其具体流派包括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批评(参见 M. H. 艾布拉姆斯. 文学学术语词典(第七版)[M]. 吴松江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77—486.)。本书拟采用思潮意义上的用法。

历程。在绪论中,笔者主要就本书的选题缘由、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现状与意义进行必要的阐述与说明。

一、问题的缘起

如同阿尔都塞所言:“问题的提出必须先具备以下的条件:确定提出问题时的理论认识环境;确定提出问题时的具体场合;确定为提出问题所需要的概念。”^①国内文论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将西方语言批评理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引进、借鉴与转换。在诸多研究领域与方面,这种“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效地推动或启迪了我国文论的自身建设与现代转型,如关于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叙事学研究、文体研究、符号学与修辞学研究,以及批评方法、模式等等层面的研究与变革^②。但是,在这一理论的转换过程中,由于历时性的西方学术思潮汹涌澎湃地在中国进行共时性冲击,使得国内的文论研究往往忙于对各种不同的“方法”与“理论”进行操持和演练,从而忽视了对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演变脉络的理论梳理与深入反思^③。而恰恰是由于这种语言意识的欠缺,在对西方乃至我们自身文学语言研究的认识与定位上,国内学界往往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严重误读。这一点,从以下七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称谓^④之中即可窥见一斑:

(一)“语言学批评(或文论)”。在这种理论概括之中,它被视为一种在语言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5.

② 许多著作都从不同层面对之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如董学文、金永兵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庄锡华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张婷婷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卷》(上海:上海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童庆炳等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就后者而言,如屈雅君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俊蕾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都探讨了其对于我国文学批评方法、模式的具体影响。

③ 不是说没有反思与梳理,而是往往从方法、模式相互“取代”或“替换”的意义上来进行。如袁雪生的《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向与回归》(《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以及于永顺、刘晋绘的《新世纪文艺批评形态的走向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话语概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二期)、王一川的《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兼谈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等等理论文章。

④ 笔者主要是以中国期刊网(CNKI)等网络电子资源,以及能收集到的现实出版著作作为主要资料来源来进行总结的。由于涉及此方面的论文与著作过多,所以在文中不一一道来,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来进行概括。

学的平台上研究文学基本问题的文学理论方法,即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与方法,“对文本的封闭性进行内部研究或纯形式分析”^①; (二)“形式主义文论(或批评)”。在这种理论表述之中,对文学的语言研究被当成一种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依托,将封闭的语言形式、结构系统作为独立自足的文学本体,并“以研究‘形式’为己任”^②的批评模式与类型; (三)“文体批评”。在这里,文学的语言研究被视为一种结合语言学理论,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各种语言要素,进而突出文学语言本体的批评理论^③; (四)“文本主义文论(或曰文本批评)”。这一称呼认为它是直接指向或“服膺于文本中心主义”^④的文学研究范式,即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独立自足的语言系统进行形式研究,从而摒弃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意图、读者接受等等外部因素; (五)“西方形式美学”。在这一定位中,语言研究就是“由语言形式出发、环绕语言形式对文学的研究”^⑤的美学范式,而由于它“将形式等同于语言,所谓的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语言的批评”^⑥; (六)“语言论美学(或语言诗学)”。这一定位认为它是“以语言和语言论为中心及理想范型”^⑦的美学研究模式,包括对语言形式和“话语”的研究; (七)“语言批评”。本书所采用的这一理论表述明确指出:作为一种现代批评话语,“语言批评不应局限于形式主义的认识”^⑧,它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视域,即文学研究的“语言形式”视域与“语言文化”视域。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说法各异,但就总体倾向而言,除却第六种与第七种理论表述之外,其余的五种理论命名都基本把语言研究界定为坚持“形式本体论”^⑨的文学研究,或者说等同于一种仅仅关注文学形式问题的“形式研究”,从而将语言批评与 20 世纪晚期整体“向外转”的文论潮流隔离开

① 肖翠云. 行走在文本与文化之间——论中国语言学批评[D]. 苏州大学博士论文, 2006.

② 蔚志建. 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之论[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 (2).

③ 杨传普. 现代文体学世纪回眸[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

④ 傅修延.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⑤ 赵宪章. 形式美学之可能[J]. 江海学刊, 2000, (3).

⑥ 赵宪章等. 西方形式美学: 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5.

⑦ 王一川. 语言乌托邦——20 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

⑧ 孙宪文. 语言批评的世界: 求索于言意之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2, (1). 事实上, 这种表述与第六种表述都是基本符合语言批评实情的, 排除了把语言研究仅仅视为“形式研究”的偏差。但由于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学批评学的学科领域内进行。因此, 笔者认为采用这一界定更符合本学科的特点, 以及本书所研究的范围。

⑨ 详见苏宏斌. 文学本体论引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4。在该书中, “形式本体论”被著者细分为作品本体论、结构本体论、叙述本体论以及技巧本体论等等类型, 认为其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品的形式层面视为文学的本体。

来。严格来说,这一总体倾向是不完整和不确切的,忽略了20世纪的语言批评其实是在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并非始终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并围绕着语言的形式范畴展开的,也并非只是涉及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这几种文学理论思潮。同时,它也忽视了各种语言批评理论在探讨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方式、理论旨趣,以及知识背景上所存在的重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如是理解不仅低估了语言研究在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从而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认识与理解,而且也严重阻碍了我们自身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本问东西的存在”^①,这种对于文学语言研究的话语误读不仅表明了国内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或遗漏之处,以及可能存在的理论研究空间。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回到西方文论语境,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研究何以、如何发展演变进行系统分析与探讨,从而准确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批评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本书的选题正是基于此而来的。

二、研究综述

本部分集中对与本书选题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其针对对象主要是那些认为语言批评不限于或不等同于“形式研究”,且以此认识为基础来展开相关研究的理论文章与著述。

(一) 国外研究

就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西方学界有不少学者、批评家都认为语言批评是在不断发展与演变的,“语言”始终是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中心话题,并进行了角度各有不同的阐述与论证。

美国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的主要代表保罗·德·曼与J.希利斯·米勒,分别对语言批评(“文学的语言研究”)的整体状况,及其流变进行了相关评述。德曼在其《阅读的寓言》、《理论的抵制》等理论著述中明确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化批评其实是前期“形式批评”的延续与发展,这一时期批评关注的是“关于语言所涉及的非词语的‘外部’的论述,语言正是受这个‘外部’限制并依据它发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66.

挥作用的。”^①而与其他任何形态的研究方法相比,“文学性的语言学(语言批评——笔者注)”更能揭示出这种由语言与现实、指称与现象相互混淆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变异。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论文学》等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按照文学批评理论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及其侧重点,把语言批评划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主要是立足于语言本身的层面,探讨文学的“自律”问题,“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②后期则主要从语言活动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他律”问题,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③德·曼与米勒的这种研究或划分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思路启发,即要从语言意识嬗变的角度来把握语言批评发展的内在逻辑。

Habib 在《文学批评史——由柏拉图到现在》一书中指出:在文学研究之中,大部分现代性批评潮流或趋势都汇聚于一个方面,即承认语言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与必需性,语言问题是这一时代所有问题化(主要是思维过程与“现实”的塑造)界限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均强调“语言的内在构成性角色”^④,高度关注对于语言形式的理论研究。而德里达、拉康、福柯等理论家则将语言研究与无限开放的语境因素关联起来,强调语言的建构性功能与制度性力量,如德里达认为“无物在语言之外”,强调没有什么现象不具有文本性的特征。这些理论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为文学研究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与封闭提供了可能。同时,Habib 还进一步描述了包括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在内的“新”的批评运动,都将语言分析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点,认为文学艺术是“被突出为通过语言媒介来支配一切的行动”,它既参与了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性别、种属(ethnicity)与人种(race)等等因素所进行的历史建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自身也成为了社会性、历史性的语言产物。英国学者凯瑟琳·贝尔西则认为后结构主义思潮其实是“后索绪尔派”^⑤,它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基本原理的改造与重新阐释,将语言与社会、历史因素关联起来,对体现在语言运用或阐释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分析,从而促成了文学批评

① [美]保尔·德·曼. 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M]. 沈勇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

② [美]J. 希利斯·米勒. 重申解构主义[M]. 郭英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6.

③ [美]J. 希利斯·米勒. 重申解构主义[M]. 郭英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6.

④ M. A. R.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568-569. 该书的引文统一以此注释来标注,不再一一赘注。

⑤ [英]凯瑟琳·贝尔西. 批评的实践[M],胡亚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

由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拉曼·塞尔登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论及后结构主义思潮时,把解构主义批评、赛义德,以及包括海登·怀特、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理论家或批评流派都纳入后结构主义思潮之中,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背叛”。在其主编的《剑桥文学批评史》第八卷的核心章节——“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之中,他进一步将俄国形式主义直至后结构主义视为一条前后相继的发展脉络。而且,他还专门开辟一节论述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它对20世纪文学批评范式转变的推动作用,并着重指出其影响途径:“奥斯丁的述行概念是通过德里达与塞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论争而进入文学理论的。”^①戴维·格曼在《言语行为理论在批评中的运用与滥用》一文中也说道:“强调文学意义是由言语行为产生的观念,进而各自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使之出现了滥用的状况,似乎可以用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②

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享有盛誉的《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中,真正被列为“形式主义者”的只有肯尼思·伯克、艾亨鲍姆、布鲁克斯、艾略特、兰色姆、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等七位理论家,被列为形式主义谱系的批评流派也只有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③,而它们主要是把诗歌而非整个文学看成自足的实体。该文选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把文学视为一个由复杂符号系统构成的文类(genre),一方面保留了(俄国——笔者注)形式主义遵循自身艺术规律运作、相对独立的话语模式之外,同时也引入了社会学的概念‘惯例’(convention)。而惯例不仅包含文学的惯例,也包含语言的和文化的惯例,在这里文学和社会通过‘话语’开始重新连接起来。”^④在此基础上,该文选还进一步指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批评活动“质疑并完全打破了语言镜像论……即语言不是透明的媒介。任何语言的使用,不论是日常的,还是标准的(typical),都包含了诸多历史惯例、传统和象征机制以及权力关系,这些影响因素是使之看起来是透明的,从

① Raman Seld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 8,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347-374.

② David Gorman. The Use and Abuse of Speech-Act Theory in Criticism, Poetic Today, Vol. 20, No. 1, spring, 1999:93-119.

③ Vincent B. Leitch, Gener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xxi-xxii. 18.

④ Vincent B. Leitch, Gener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5.

而混淆了事物与语词之间的关系”^①，并将海登·怀特、鲍德里亚、霍米·巴巴、朱迪斯·巴特勒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女性主义乃至文化研究的代表理论家都列入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中。这种观点或归纳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国外学界对于语言批评的认识。同时，它对于本书研究语言批评自身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开放性及其发展演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些相关研究零星分布于各种不同的理论著作之中。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特雷·伊格尔顿虽然主要是从“学理”层面来研究20世纪文论的整体状况，并没有把语言批评当成一个专门的理论谱系来分析，但他明确指出：整个当代文学理论始终是围绕着语言问题展开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其“西马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中，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流派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并指出了瑞恰兹的语言研究模式与雅各布森的语言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英美新批评的“语言意识”及其异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提出了“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向历史趋势开放”^②的批评主张。事实上，这一理论批评实践本身就是对文学语言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正是基于此，戴卫·赫尔曼也郑重指出：“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③他认为后现代叙事学其实是对语言批评分析传统的继承与深化，是对潜在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之中的丰富思想的重新思考与拓展运用。这些观点对于本书研究而言，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资源。

当然，上述研究也存在着些许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求异甚于求同。上述研究虽然注意到语言问题在整个西方文论演变中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研究之中，尤其是在对20世纪晚期文论所进行的研究中，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不同理论流派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而并没有把它们共同之处作为探讨重点。

（2）外部原因与内部逻辑的不对称。在探讨语言批评维度演变的基本动因时，大多数理论研究都侧重于从社会转型及其思潮背景的层面来展开系统探讨，而关于内部逻辑方面的理论成果则相对零散。

^① Ibid, p.6.

^②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M]. 钱佼汝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82.

^③ [美]戴卫·赫尔曼. 新叙事学[M]. 马海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3) 整体概括多而过程分析少。上述研究往往侧重于对整体理论的转变做总体性概括,而在演变的具体过程、特征方面则着墨相对较少。即便有所涉及,也大多集中于结构主义谱系内部或某个理论家(如罗兰·巴特)相关观点的影响上,而并没有专门分析语言批评理论内部不断滋长的“突破”要求。

(二) 国内研究

在目前,国内文论界对这个方面进行研究的理论著述还相对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是从语言观念、研究对象、批评模式与语言理论资源等角度来展开研究的。而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之中,这些视角往往交杂在一起,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对于本书研究而言,这些理论成果都有着重要的思路启发与借鉴意义。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侧重于从语言观念或问题意识出发来进行相关研究。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把文学理论对于语言问题的思考当成其自觉的问题意识,以此来考察语言批评的维度演变,其主要代表是孙文宪、赵毅衡与赵奎英等学者。

一直致力于语言批评研究的孙文宪非常明确地指出:“语言研究不等于形式研究”^①,语言批评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语言批评的演变》等论文中,从西方文学研究的知识语境出发,对20世纪语言批评的演变,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他指出,按照语言研究思路的变革,语言批评经历了由“关注‘语言形式’到突出‘语言文化’”^②的发展演变,其外延涵盖了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开端,直至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思潮。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孙文宪对语言批评所进行的系列探讨具有极大的理论启发意义,本书将文学语言研究定位为“语言批评”就是受到孙文宪的启发。赵奎英也认为除却狭义的“语言形式”研究之外,语言诗学还应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化”研究,语言问题始终是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是“文化批评”得以形成的基础^③。赵毅衡则在《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形式论是自我涨破形式主义的。”^④在他看来,在形式文论/符号学/叙事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形式研究只是一个跳板,随着它们对语言的符号特性的认识深化,文论发生了“叙述—伦理

① 孙文宪,王丹. 语言转向: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J]. 北方论丛,2011,(1).

② 孙文宪. 语言批评的演变[J]. 长江学术,2008,(3).

③ 赵奎英. 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与语言文化诗学[J]. 学术月刊,2010,(9).

④ 赵毅衡. 重访新批评[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

转向”。

第二,以研究对象或批评模式为主要依据所进行的研究。这个方面的主要代表是王一川、王汶成与南帆等学者。

在早期的理论研究中,王一川主要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批评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关注形式到聚焦话语的过程^①。他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语言批评理论的语言观、理论特征等做了详细的分析,以此来说明研究对象的变更在语言批评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他基本是按照批评模式来进行划分,认为语言批评经历了一个由词义分析、结构语言模式到解构、历史—文本和寓言—历史模式的演进过程^②,包含的批评流派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他对这些批评模式的理论关注点及其批评操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概括,这为本书研究语言批评之间的具体联系与差异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本书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王汶成则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始终是以“对文学语言研究的进展为根基、为依托的。”^③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是语言形式研究与语境因素或“外部”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南帆大体上也持此观点,同时,他认为文学批评对语言问题或文学形式的探讨,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内部的形式问题与语言形式的历史维度(意识形态/权力、无意识/欲望)^④。

第三,以语言理论基础为中心所展开的研究。这个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周宪、张杰、杨大春和赵大刚等研究者。

周宪、张杰在《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从“固体”到“流体”》、《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与《批评的转向:从语言学走向话语学》等理论文章、著作中指出: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两次“语言学转向”,分别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以福柯、本维尼斯特等理论家为代表的言语理论作为基本理论资源,并依次建立了文学理论的现代(科学)范式与后现代(艺术)范式。强调语言形式的现代范式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与英美新批评,而后现代范式则涵盖了后结构主义思潮乃至广义的文

① 详见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在该书中,他主要是立足于美学视野(一般艺术)来对语言批评的诸种模式进行划分。因此,其具体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的领域。

② 详见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5—212。

③ 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4。

④ 南帆,《历史与语言:文学形式的四个层面》[J],《文艺争鸣》,2007,(11)。

化研究,它主要研究语言活动的建构性及其背后的“规训机制”(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杨大春则在《文本的世界》等著作之中,从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基本原理的影响出发,将语言批评的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1.以结构主义文论为主要代表的“索绪尔主义”(强调文本结构的稳定性、意义的确定性);2.以狭义的后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的“后索绪尔”主义(强调语言的差异性、文本结构的不稳定性)^①。而赵大刚的论述把关注点放在探讨种种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具体影响与引领作用之上,他将新近兴起的认知诗学也归结到语言批评的范围之内^②。相较于前二者而言,这种研究思路更为开阔,但不足的是,它在具体分析上缺乏有效的理论论证作为支持。

在这个方面还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不少青年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注意到分析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在语言批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理论影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三篇博士论文:张瑜的《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2009)^③、王建香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2009)^④以及谢龙新的《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2011)。在其中,谢龙新主要侧重于对言语行为理论与叙事转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此来展现结构主义叙事学转向后经典叙事学的基本动因^⑤。而张瑜与王建香的论文则基本是立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传播以及应用方面,以此来梳理这一语言理论对读者反应批评以及解构主义等文论潮流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建构或批评实践。前者主要从“实践论转向”的角度来构建语言论文论,后者则主要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述行视角出发,对文学话语的述行属性与建构特征进行分析。就其共同点而言,三者都从不同方面注意到,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支持下,语言批评的理论关注点由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转向了言语行为,由拒绝社会、历史到关注文本之外的语境因素。就此而言,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语言批评的范式转换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分散的观点见诸于各种理论文章之中。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具体的语言批评流派或批评家为观照对象,侧重于阐明它们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并非仅仅停留在文学文本的“形式”层面。如李广仓从结构主义批评

① 杨大春. 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68.

② 赵大刚. 当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及动态研究[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 (6).

③ 张瑜. 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④ 王建香.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⑤ 谢龙新. 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1.